

安全困境与族群冲突

——基于“机制+因素”的分析框架^{*}

王 凯 唐世平◎

【内容提要】 族群冲突是冷战后数量最多的“热战”形式，目前的大部分研究不重视对这一社会结果的机制性理解，因而未能完整地解释族群冲突发生的因果机制。虽然有少数研究包含了对族群冲突的机制性分析，但这些研究未能厘清机制与因素的互动关系。本文认为，“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将各种调节因素通过驱动力联系到安全困境机制——能够有效填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为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式的族群冲突理论奠定基础。本文理论部分首先分析了四个重要的行为驱动力（恐惧、不满、仇恨和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如何调节族群间安全困境机制，然后讨论了七个因素（政治不稳定、族群政党系统、歧视性的族群政策、经济衰退、族群间经济差距的变化趋势、历史冲突、族群人口分布的类型）对这些驱动力的影响。随后的实证部分应用这一分析框架解释了捷克斯洛伐克（1968—1993）和南斯拉夫（1971—1991）两个案例中族群政治的不同走向，显示了这一分析框架的理论潜力。

【关键词】 安全困境 族群冲突 机制 因素

^{*} 本文是在王凯硕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本文也是唐世平建立一个更加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本研究获得复旦大学 985-3 期项目“对全球现代化经验和教训的考察”的支持（项目号：2011SHKXZD011）。

一 引言

苏联的解体和巴尔干地区的族群战争再次引起了社会科学界对族群冲突的普遍关注，但族群冲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远不止于此。^① 首先，二战后超过半数的内战属于族群战争；^② 其次，族群冲突往往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例如仅 1993 年，全球由于族群冲突而产生的难民就达到 2500 万；^③ 最后，族群冲突还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如泰米尔猛虎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爱尔兰共和军等恐怖组织的出现都与族群间的严重冲突有关。^④

虽然对族群冲突的理解十分迫切和必要，但是目前的理论尚未向我们展现一个关于族群冲突的完整故事。定量研究只能告诉我们某些因素可能更容易导致族群冲突，定性研究往往只关注非常有限的因素对族群冲突的影响。此外，目前的研究缺乏对社会结果的机制性解释，常采用线性思维来理解复杂的社会事实。部分研究虽然包含了对机制的分析，但仍不能厘清机制与因素之间的关系。^⑤

本文认为族群冲突的研究必须采用整合式的研究路径，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理论上的困难和不足。唐世平 2011 年提出的研究族群冲突的“安

① 本文中所提到的“族群”“族裔”“民族”和“民族主义”分别对应英文中的“ethnic group”“ethnicity”“nation”和“nationalism”的概念。关于这些概念的区分参见 Ea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② 参见 UCDP/PRIO dataset 2010, <http://www.pcr.uu.se/research/ucdp/datasets/>;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Sons of the Soil, Migrants, and Civil War,” *World Development*, Vol. 39, No. 1, 2011, pp. 199–211。

③ Ted R. Gurr and Barbara Harff, *Ethnic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C. O.: Westview, 1994)。

④ 参见 Stuart J. Kaufman, “Symbolic Politics or Rational Choice? Testing Theories of Extreme Ethnic Viol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4, 2006, pp. 45–86; Minorities At Risk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AROB) 数据库, <http://www.cidcm.umd.edu/mar>。

⑤ 关于机制对于社会科学探究的重要性的讨论参见 Mario Bunge, “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27, No. 4, 1997, pp. 410–465。

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即在准确理解安全困境机制的前提下，将各种调节因素通过驱动力联系到该机制）为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式的族群冲突理论奠定了基础。^① 本文在此基础上对这个分析框架进行了初步具体化，并使用比较案例研究验证了这个分析框架的可行性和解释力。

本文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和评论为后文的讨论奠定基础。第三部分首先分析了四个重要的行为驱动力（恐惧、不满、仇恨和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如何调节族群间安全困境机制，接下来讨论了七个影响驱动力的因素，最后展现了初步具体化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② 第四部分通过比较捷克斯洛伐克（1968—1993）和南斯拉夫（1971—1991）两个案例验证了此分析框架的解释力。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有三点需要说明。

首先，本文并未分析所有作用于人类行为的驱动力（如未分析“荣誉”和“利益”）和所有可能影响这些驱动力的因素（如未分析“是否存在第三方的干预”）。实际上，穷尽所有驱动力和因素并不是本文的写作重心。相反，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唐世平2011年提出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的可行性和解释力。

其次，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放在验证分析框架上并不意味着本文对因素的选取和分析是随意和盲目的：^① 本文选取的七个因素都分别受到学界一定程度的关注，并且涵盖了社会科学分析的大多数维度（结构、制度、政策、经济、历史和地理）；^② 这七个因素已能够展示一个精炼而完整的“机制+因素”解释框架。

最后，本文仅选择性的将影响人类行为的四个重要驱动力（恐惧、不满、仇恨和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纳入分析框架，这样做的考虑是：

^①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Toward a Dynamic and Integrativ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4, 1997, pp. 410–465.

^② 为了行文的简洁，下文出现的“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都是指“精英出于自利的目的而使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组织和动员族群的能力”。同时，本文大多数时候使用“安全困境/机制+因素”来指代“安全困境机制通过不同的驱动力将各个因素串联起来”这种分析路径。

1. 这四个驱动力历来受到社会科学家的重视, 并且能够有效地将本文的七个因素与安全困境机制联系起来; 2. 被本文忽略掉的其他行为驱动力(如“信任”和“荣誉”等)大多可以被整合进本文的分析框架内, 例如“(不)信任”可以减弱或增强相互间的“恐惧”, “恐惧”还可以反过来影响“(不)信任”的程度。^①

二 文献回顾和批评

关于族群和族群政治的早期理论基本都承认族群问题的出现与欧洲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密不可分。^② 冷战结束后, 源于理解现实政治的需要,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兴趣转向了族群冲突领域。面对族群研究领域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 本文只集中讨论与族群冲突相关的学术著作。

(一) 族群数据库及定量分析的局限

目前, “处于危险中的少数族群”是研究族群冲突的学者最常用的一个综合性数据库。^③ 但是, 随着族群冲突研究的深入, 这个数据库定义变量的方式、搜集数据的方法和变量的种类渐渐不能满足所有研究者的需要, 一些新的数据库不断出现, 如“族群权力关系”数据库、^④ 关于族群地理分布的数据库^⑤和关于族群间宗教歧视问题的数据库。^⑥

① Ship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2008, pp. 451–471.

② 参见 Ernest Ea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83)。

③ Minorities At Risk, 项目网站: <http://www.cidcm.umd.edu/mar>。

④ Ethnic Power Relation, 项目网站: <http://www.epr.ucla.edu/>。

⑤ Geo-referencing of Ethnic Groups, 数据库参见 Nils B. Weidmann, Jan Ketil Rød and Lars-Erik Cederman, “Representing Ethnic Groups In Space: A New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4, 2010, pp. 491–499。

⑥ Religion and State-Minorities, 数据库参见 Yasemin Akbaba and Jonathan Fox, “The Religion and State-Minorities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8, No. 6, 2011, pp. 807–816。

族群冲突数据库的不断涌现为学者使用定量方法提供了便利，但定量研究的方法不是万能的。首先，传统的以回归分析为核心的定量研究只能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缺乏对过程和机制的关注。其次，由于不同研究使用的数据和操作化方式不同，导致定量研究无法提供清晰的理论。因此，只有将定量研究与其他研究方法结合使用，才能提供更多的知识增量。^①

（二）对族群间安全困境机制的关注

自巴里·波森 1993 年首先将安全困境机制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引入族群冲突研究领域以来，很多学者运用了该机制（至少在字面上使用了“安全困境”）对族群冲突进行理论分析。^② 不过，学界对安全困境机制的理解和使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仅仅将安全困境作为一个前提条件或一个自变量，^③ 将安全困境等同于冲突螺旋，^④ 或将安全困境简化成“承诺问题”，等等。^⑤ 这些泛化安全困境机制的倾向，反而导致安全困境机制的解释力受到质疑。^⑥

但是，上述批评是建立在错误理解安全困境机制（理论）的基础上的。实际上，安全困境机制（理论）不仅仅强调国家中央政权控制力的突然或渐渐衰落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下的相互恐惧，而且可以将国

① John Gerring, “What Is a Case Study and What Is It Good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2, 2004, pp. 341–354.

② Barry Posen,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 Vol. 35, No. 1, 1993, pp. 27–47. 关于族群冲突学者对安全困境机制的使用谬误以及对这批文献的详细批评，参见唐世平的研究综述：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③ Erik Melander, “The Geography of Fear: Regional Ethnic Divers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No. 1, 2009, pp. 95–124.

④ Badredine Afri, “Ethnic Fea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security,”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1, 1998, pp. 151–203; Stuart J. Kaufman, “Symbolic Politics or Rational Choice?”

⑤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Latin, “Explaining Interethnic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No. 1, 1996, pp. 715–735.

⑥ 塞德曼等学者认为，“由于缺乏对国家角色的关注，安全困境机制不能有效地解释族群冲突”。参见 Lars-Erik Cederman, Andreas Wimmer and Brian Min, “Why Do Ethnic Groups Rebel? New Data and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62, No. 1, 2010, pp. 87–119。

家制度安排、政府政策以及政治精英的角色等因素融入一个动态的和整合的“制度 + 因素”分析框架。这样的“安全困境/机制 + 因素”分析框架不仅能扭转族群冲突研究“碎片化”的趋势,而且可以贡献新的知识增量。

(三) 心理驱动力在族群冲突文献中的角色

唐纳德·霍洛维茨在其被广泛引用的著作中讨论了“相对价值的竞争”与“对灭绝的恐惧”等隐藏于族群冲突背后的群体心理,认为任何完善的理论必须能合理地解释“族群冲突中充满激情、象征性和忧虑的一面”。^① 族群冲突的定量研究常根据族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平等来度量族群之间“不满”和“仇恨”的程度。^② 虽然族群冲突研究的理性选择学派将心理因素完全排除在他们的分析框架外,^③ 但是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仍然将“心理”作为核心研究议题之一:“不满”^④ “仇恨”^⑤ 和“恐惧”^⑥ 都被认为会导致族群冲突。

虽然学界对心理驱动力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①大多数研究采用“分割性的、非此即彼的”对立态度看待多种心理驱动力,我们依然无法理解驱动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是否相互影响,如何相互影响,进而如何共同地调节族群关系。②除了对“恐惧”的物质因素来源

①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146, 175 – 194, 226.

② 对心理驱动力的度量和操作化,可参见 Minorities At Risk 数据库。

③ 族群冲突理性选择学派的代表著作有: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1, 2003, pp. 75 – 90。

④ Roger Petersen, *Understanding Ethnic Violence: Fear, Hatred, and Resent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⑤ 参见 Stuart J. Kaufman, *Modern Hatre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⑥ Osmar Shahabudin McDoom, “The Psychology of Threat in Intergroup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2, 2012, pp. 119 – 155. 麦多姆在论文中承认了他的研究存在两个不足: 单一情感变量(只分析了“恐惧”,没有讨论其他心理因素)和单一因果关系(威胁导致群体态度的极化)。

研究的比较充分外，学界对其他心理驱动力与物质因素的因果关系缺乏实证讨论。

（四）关注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机会

族群冲突学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逐渐认同区分群体行为背后的“动机”和促成群体行为的“机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斯图尔特·考夫曼认为族群战争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必须存在政治机会，这种政治机会不仅需要一定的政治空间（政府垮台、政治自由化等），还需要地理上的根据地。^①

本文认为，学界对“机会”的关注其实源于分析精英动员族群“能力”的需要，但是，使用“动机—机会”二分法却造成了将“机会”等价于“能力”的谬误。事实上，“机会”并不足以反映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无论是结构性还是物质性的“机会”，归根结底都是一些因素，使用“机会”一词而非“因素”反而造成了理论混乱。本文认为使用“因素—驱动力（能力）”代替“动机—机会”二分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厘清因果关系链条。

三 “安全困境/机制 + 因素”的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一个整合式的研究路径能够解决族群冲突研究领域存在的理论分歧，扭转碎片化的研究趋势，并贡献新的知识。建立在准确理解安全困境机制的概念和理论效力的前提下，下文将首先分析人类的四种行为驱动力如何调节族群间安全困境（见图 1），接下来讨论七个影响驱动力的因素，最后展现一个初步具体化的“安全困境/机制 + 因素”分析框架（见图 2）。

① 参见 Stuart J. Kaufman, “Symbolic Politics or Rational Choice?” 其他使用这种二分法的文献如: Havard Hegre, Tanja Ellingsen, Scott Gates and Nils Petter Gleditsch, “Towards a Democratic Civil Peace?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and Civil War, 1816 – 199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1, 2001, pp. 33 –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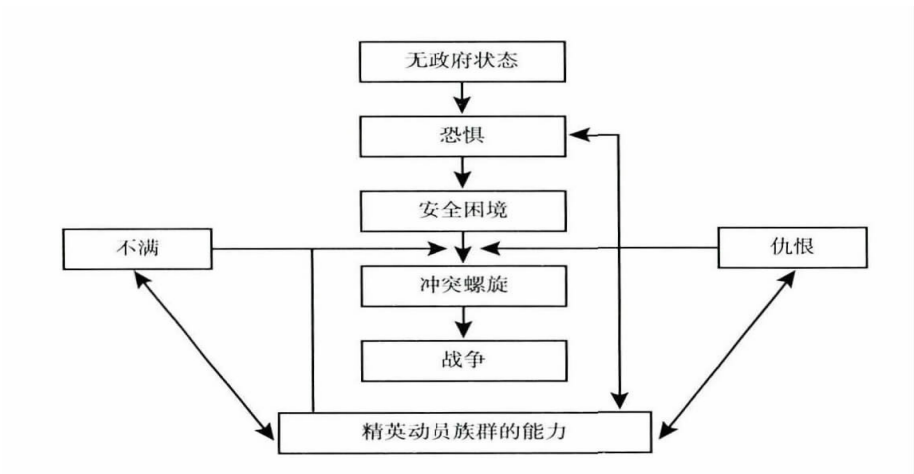


图 1 驱动力对安全困境机制的调节

说明：图 1 以及下面图 2 未展现三种心理驱动力的相互作用：①因为三种心理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未涉及本文的核心逻辑链条（因素—驱动力—机制）；②本文对三种心理驱动力相互作用的讨论只是初步的，对于后续研究的需要仍然十分迫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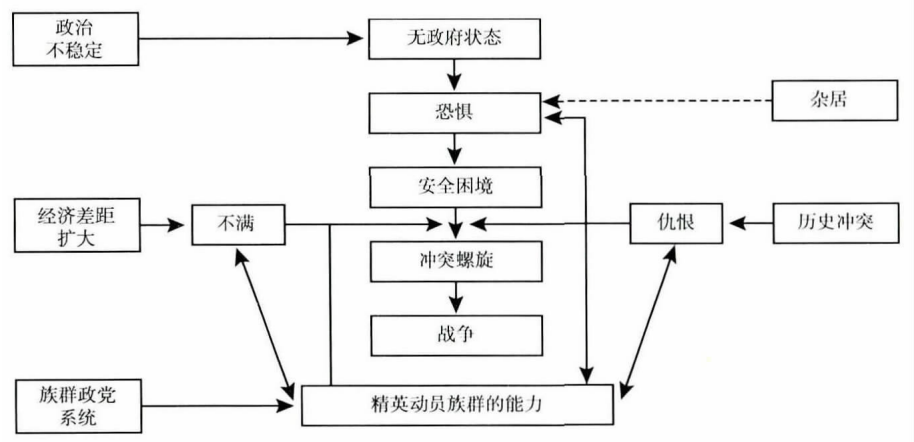


图 2 初步具体化的“安全困境/机制 + 因素”分析框架

说明：图 2 并未展现本文的 7 个因素对 4 种驱动力的所有调节作用：首先，这样可以使逻辑图更加简洁；其次，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表明“安全困境/机制 + 因素”分析框架的可行性和解释力，而非解释某些特定因素对安全困境机制的调节作用。后文对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做了简单的探讨，但是同样出于简洁的考虑，图 2 也未显示这种关系。图中的虚线表示虚线两端的因素与驱动力不存在单纯的因果关系，而是“A 因素不能导致某种驱动力的出现，但是能够调节这种业已存在的驱动力的强弱程度”。

（一）安全困境与驱动力

1. 作为“现象”“理论”和“机制”的安全困境

学界已经对“安全困境”进行了精细的概念分析，指出这个源自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族群冲突。^① 本文对“安全困境”概念的使用，包含了“现象”“理论”和“机制”三个层次。

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现象，“安全困境”描述了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由于无法确定其他国家现在和未来的意图而产生了不确定性和恐惧感，为克服这种不确定性和恐惧感，国家不得不通过实力竞争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但是，实力竞争的结果反而使得国家更加不安全。

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安全困境（理论）”认为，“无政府状态、行为体互相之间没有恶意、出于自我保护目的的实力竞争”三者的组合构成了激活安全困境（现象）的充分必要条件。这样的理论区分也告诉我们“安全困境”不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冲突螺旋”。受行为体互动和各种因素的调节，“安全困境”可能被恶化为“冲突螺旋”，“冲突螺旋”的进一步恶化可能导致战争。^②

作为一种机制，“安全困境（机制）”代表了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过程，它可以将某些因素串联起来，从而引发或者阻止整个系统或次级系统的变化。^③ 社会系统的变化反映了人类互动的过程和结果，而人类互动

① 对安全困境更加精细的讨论，参见 Sh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② “无政府状态—潜在的安全困境—被激活的安全困境—冲突螺旋—战争”逻辑链条绝非是简单明了的，本文简化了这个逻辑链条。详细论述参见 Sh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pp. 64–66。

③ 关于“机制”的定义，马里奥·邦奇 (Mario Bunge) 强调“机制是一个能引发或阻止系统或次级系统变化的过程”，唐世平认为“机制能够将某些因素串联起来，从而驱动变化或阻止变化。反过来说，因素只能通过机制才能驱动变化或阻止变化”。参见 Mario Bunge, “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唐世平的讲义《迈向基于机制的解释和理解：负面案例和反事实思考》，<http://www.sirpa.fudan.edu.cn/picture/article/56/88/ac/7c64a8d340368df7c344a544924c/7b9a125b-24d1-4517-b49f-a30ff32f0126.pdf>。

必然受到各种行为的驱动力的影响,因此,各种调节因素必须通过作用于人类行为的驱动力来影响人类的互动。在人类互动过程中,安全困境机制可能被遏制,或者被恶化。

2. 驱动力对安全困境机制的调节作用

由于本文的写作目的是通过初步具体化“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来验证其理论潜力,本文有选择性地将影响群体互动的集体“恐惧”“不满”和“仇恨”,以及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这四种行为的驱动力纳入分析框架。

心理(情感)能够驱动人类行为是毋庸置疑的。社会心理学早就承认心理“情感”(affect)和理性“认识”(cognition)存在着互动,并且共同作用于个人做决定和行动的过程中。^①此外,集体行动理论告诉我们集体动机并不足以导致政治动员和暴力冲突。^②为了理解人类集体行为导致的社会结果,对精英角色的分析不可缺少,因此,本文将“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作为另一种行为驱动力。本文认为,这四种行为驱动力能够相互作用,共同调节安全困境,从而决定安全困境和冲突螺旋是被恶化还是被遏制(见图1)。

(1) 四种驱动力分别对安全困境机制的独立调节作用

族群精英出于自利的目的而利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动员族群大众的“能力”能够有效地影响族群互动,调节族群间的安全困境。“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越强,安全困境恶化的可能性越大,恶化的速度越快。但是,如果研究者在分析族群冲突时仅仅考虑精英的“动机”和“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忽略其他重要的事实和逻辑链条,陷入“精英决定论”的套路中。

① 社会心理学领域对“影响和认识”的最新讨论,参见 Daniel Todd Gilbert, Susan T. Fiske and Gardner Lindzey,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Hoboken, N. J.: John Wiley and Sons, 2010), 5th ed., 2 Vols, p. 335。

② 参见 John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 6, 1977, pp. 1212 – 1241; Charles Tilly and Sidney Tarrow, *Contentious Politics* (Boulder, Colo.: Paradigm Press, 2006)。

在无政府状态下，族群成员因为不能确定另一个族群当前和未来的意图而产生的“恐惧”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族群相互之间的“恐惧”长期得不到缓解或者被进一步增强，族群为克服“恐惧”而进行的实力竞争加剧，族群间的安全困境更加容易恶化成冲突螺旋，族群冲突和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群体“不满”反映了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或结果感到不公平，并且希望对此进行改变。根据群体“不满”对象的差异，群体“不满”可以分为群体（个体）对其他族群的“不满”以及群体（个体）对中央政权的“不满”。精英对族群群体情感的操纵会改变族群成员“不满”的对象（如将族群成员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导向其他族群），影响“不满”的强弱程度。如果族群相互间的“不满”是主要维度，则安全困境可能因为族群成员追求“满意”“公平”的努力而被恶化成冲突螺旋。

此外，相比“不满”和“恐惧”，“仇恨”对行为的驱动力更强，因为“仇恨”心理本身就包含着采取敌对行动的倾向，^①集体“仇恨”的宣泄导致任何暴力行动都可以挂上“集体复仇”的正当理由。因此，“仇恨”的出现和增强极易将族群间的安全困境恶化成冲突螺旋和族群战争。

（2）四种驱动力相互之间的正向反馈^②

① “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与三种心理驱动力

“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与其他心理驱动力存在相互增强的效果。一方面，族群间的集体“恐惧”“不满”和“仇恨”的存在及其强度构成了族群问题在社会中的“显著性”（salience），“显著性”的上升可以进一步增强精英的“能力”。如果国家内部不存在族群裂隙（ethnic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仇恨是一种希望摧毁不幸福的来源的自我心态。参见 Sigmund Freud, “The 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 in James Strachey e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IV (1914–1916):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apers on Meta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 ii–viii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57), p. 137.

② 关于正向反馈以及更广义上的系统效应，参见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46–147.

cleavage) 和族群问题的“显著性”, 则精英的资源(如财富、智力、组织机构) 很难转化成“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

另一方面, “族群动员能力”的提升使得精英有更多的意愿“投资”族群冲突而不是民主制度的建设, 从而导致三种心理驱动力的强度被迅速增高。“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的提升使得精英既可以通过煽动性的宣传放大本族群对其他族群的“不满”“恐惧”和“仇恨”, 还可以通过一些挑衅性含义更浓的行为(如推行歧视性的族群政策) 增强其他族群对本族群的负面情感。^①

②三种心理驱动力之间的相互影响

“不满”“恐惧”和“仇恨”这三种心理驱动力存在相互增强的效果, 因为这三者都暗含了“期望改变”的心态。“不满”与“仇恨”都反映了行为体因自身利益或荣誉的得失而产生的期望改变现状的动机, 而“恐惧”则体现了行为体因为害怕将来可能的损失(安全、地位) 而产生的期望改变现状的动机。“得到的东西少、或者失去了东西”都会造成“不满”; “失去了很多东西”能够导致行为体的“仇恨”; “可能失去很多东西”引起“恐惧”。

例如, “仇恨”可以增加其他心理驱动力的强度: A 族群对 B 族群的“仇恨”可以导致 A 族群对 B 族群的“不满”显著升级; 此外, A 族群对 B 族群的“仇恨”及其外在表现能够增强 B 族群对 A 族群的“恐惧”。

(3) 小结: 四种驱动力对安全困境机制的共同调节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确定: 首先, 四种驱动力各自的出现和增强分别能够恶化族群间的安全困境和冲突螺旋; 其次, 四种驱动力之间的相互

^① 斯图尔特·考夫曼对族群冲突两种类型的区分(Mass-led, Elite-led) 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即族群问题的显著性和精英的能力哪个是导致族群冲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他的解决办法略显粗浅。比如, 如果将族群问题显著性的“高低”和精英动员族群“能力”的“强弱”组成一个“2×2”的表格, 研究者就可以得到四种反映族群政治的组合。相比考夫曼的二元分类, 这四种组合能够更好地解释族群政治的不同形式。参见 Stuart J. Kaufman, “Spiraling to Ethnic War: Elites, Masses, and Moscow in Moldova’s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2, 1996, pp. 108 – 138。

作用属于正向反馈。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如下命题具有合理性：第一，任意一种驱动力的出现或增强，都会导致其他业已存在的驱动力增强。第二，在族群互动中出现的驱动力的种类越多，驱动力的程度越强，则族群间的安全困境越可能被恶化。

（二）不同因素对驱动力的影响

不同因素通过作用于人类行为的四个重要驱动力（恐惧、不满、仇恨和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进而起到调节族群间安全困境机制的作用。基于这样的理解，同时注意把握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本节逐一分析了七个因素如何通过影响驱动力进而起到调节安全困境的作用（见表1）。

表1 因素驱动个体行为的方式

因素		驱动力：恐惧、不满、仇恨、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	对安全困境的调节
政治不稳定		恐惧	+
族群政党系统		能力	+
歧视性族群政策		恐惧、仇恨	+
经济衰退		不满	+
族群间经济差距的变化趋势	扩大的经济差距	不满、恐惧	+
	缩小的经济差距	(降低) 不满	-
历史冲突		恐惧、仇恨	+
族群人口分布类型	杂居	恐惧、仇恨、能力	+
	聚居	(降低) 恐惧、仇恨、能力	-

说明：①表1未将因素对驱动力的间接调节作用包括在内。例如，族群政党系统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而政治不稳定容易导致无政府状态下的相互“恐惧”。

②“+”表示某个因素（或者因素的赋值）能够激活、恶化安全困境，“-”表示某个因素（或者因素的赋值）能够遏制安全困境。

1. 结构因素：政治不稳定

政治不稳定对于分析族群间安全困境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国内的政治不稳定容易导致国内无政府状态的产生，而国内无政府状态正是族群间安全困境的首要来源。当国家出现政治不稳定，原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减

弱或完全消失,已有的制度安排和官方意识形态受到挑战,权力出现真空,政治精英谋求在新的政治环境或体制下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因此,政治不稳定容易导致一个国家产生实际上的国内无政府状态:(1) 中央政权渐渐(或突然)地崩溃;(2) 中央政权被某一族群所垄断。

其次,在多族群国家,政治不稳定(通过无政府状态)导致的族群相互“恐惧”既是族群间安全困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直接影响了此后族群间的和族群内的互动。如果不能缓解族群相互间的“恐惧”,安全困境将一直存在恶化的可能。

2. 制度因素: 族群政党系统

唐纳德·霍洛维茨认为,由族群政党组成的族群政党系统最容易导致族群冲突。^① 不过由于霍洛维茨对族群政党和族群政党系统的复杂定义不适合操作,本文重新定义了这两个概念: 第一,根据政党是否主要代表、反映某个特定族群的利益将政党分为两个类型——族群政党和跨族群政党; 第二,如果国内的族群政党掌控了大多数政治资源,则这个国家具有族群政党系统。^②

本文认为族群政党系统不仅容易造成政治不稳定,而且能够增强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相反,跨族群政党由于其组成方式超越了族群边界,因而有利于建立稳定的族群关系。

(1) 族群政党系统容易造成政治不稳定。族群政党系统作为一项制度安排限制了政治精英的政治选项。首先,一旦政党政治涉及族群利益,

① 关于唐纳德·霍洛维茨更加复杂的定义和分析参见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pp. 291 – 346。这里,如果多个政党都主要代表某个特定族群的利益,那么根据定义这些政党也属于族群政党。“族群政党”与“民族主义政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侧重描述政党的组织方式,后者突出强调政党的政治纲领。

② 使用族群政党系统来解释族群冲突不构成“循环论证”的谬误。乔万尼·萨托利认为政党既反映政治、社会条件,又能够作用于政治、社会过程。参见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 1, p. 192。通过分析本文的两个案例我们可能发现族群政党系统的建立往往受到具体族群政治的影响,但是族群因素并不必然决定族群政党系统的形成。更详细的分析,参见 Dawn Brancati, *Peace by Design: Managing Intrastate Conflict through Decentralization*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4。

完全建立在其他社会裂隙 (social cleavages) 上的政党就失去了政治空间。^① 其次, 由于族群中心主义的影响和利益分配的敏感性, 族群政党的领导人对其他族群“妥协”的态度容易被族群内的竞争对手攻击, 为了避免在族群内部政治竞争中落败, 族群政党领导人在族群间事务中不得不保持对外族强硬的形象。族群政党对政治空间的占领以及政治精英“妥协”的困难导致族群政党系统中很难出现长期稳定的、超越族群界限的中央政权, 因此极易造成国家政治不稳定。

(2) 族群政党系统增强了“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族群政党系统能够在两个方面增强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 一方面, 族群政党的“单一代表性”使得它能够“天然地”掌握族群聚居地区的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和资源; 另一方面, 族群政党容易采取多种手段来塑造族群集体认同, 由于集体认同是族群动员的必要条件, 因此精英在塑造集体认同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动员“能力”。

3. 政策因素: 歧视性族群政策

国家采取的族群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三大类: 融入性政策 (integrative)、同化政策 (assimilative) 和排斥性政策 (exclusive)。^② 前一种政策没有歧视性色彩, 而后两种政策都属于歧视性族群政策。苏丹未分裂前, 北方穆斯林试图在南方实行伊斯兰教法即明显的同化政策; 20 世纪 90 年代末塞族人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人的驱离政策可以被认为是排斥政策。

国家“能够”制定同化或者排斥这两种歧视性族群政策已经表明弱勢族群失去了其作为一个族群集体应该享有的、与优势族群同等的政治地位, 即优势族群已经垄断了中央政权。这意味着在歧视性的族群政策出台之前, 这个国家已经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族群间的安全困境已经被激活,

^①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p. 340.

^② 本文的“歧视性族群政策”指的是造成特定族群的集体政治或社会地位降低的政策和法律, 不包括经济方面的歧视政策。本文认为经济方面的歧视政策会直接影响族群间经济差距的变化, 因而可以被包含在后文对“经济差距”的分析中。本文没有将针对某一族群的清洗政策(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清洗政策)划入歧视性的族群政策中, 因为清洗政策更多反映了族群冲突的结果。

而歧视性族群政策的出台会进一步将族群间的安全困境恶化成冲突螺旋和战争。

歧视性族群政策不仅使弱势族群产生强烈的威胁感,而且还会导致弱势族群因集体身份被贬低和荣誉被剥夺而产生被羞辱感。威胁感会增强弱势族群已有的“恐惧”,被羞辱感则会催生另一种爆裂情感——“仇恨”。此时,安全困境会被恶化成优势族群对弱势族群的安全威胁,而弱势族群则随时可能因“恐惧”或“仇恨”而发动集体反抗,族群间的冲突螺旋(甚至战争)将会成为主旋律。^①

4. 经济因素

(1) 经济衰退

2011 年,世界银行通过对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研究发现:相比群体性的“不满”,个体缺乏经济机会更容易导致群体性反抗。在这项调查中,40% 的受访者承认自己因为没有工作而加入反政府团体,只有 13%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加入反政府团体的原因是群体性的(不满)。^②

本文认为国家的经济衰退确实会影响族群之间的互动,但是经济衰退只是影响族群间安全困境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其影响方式也不是单一的、线性的。

①经济衰退容易引发个人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在个人层面上,经济衰退导致的失业率上升和生活水平下降等首先引发个人对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的“不满”,这种对中央政权的“不满”构成了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导致经济衰退的责任并不能直接被归结到某个族群身上,但由于族群中心主义的影响,个人也会因为经济衰退而迁怒于其他族群。此外,族群精英为了推卸责任或者出于其他自利的目

① 彼得森认为族群“政治地位的逆转”造成了最强烈的不满,因此最容易导致冲突(参见 Roger Peterson, *Understanding Ethnic Conflict*, p. 256)。本文同意“政治地位的逆转”最容易导致冲突,但“政治地位的逆转”是通过催生“恐惧”和“仇恨”而非“最强烈的不满”来影响群体行为。

②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2011), p. 80, <http://wdr2011.worldbank.org/fulltext>.

的，可能将经济衰退的原因归结为其他族群的贪婪和剥削，族群精英寻找“替罪羊”的意图能够将个人“不满”的对象从中央政权转移到其他族群。

②经济衰退容易导致中央政权的不稳定。首先，经济衰退造成中央政权的声誉受损，其权威和控制力削弱；其次，相较处于经济增长中的国家，陷入经济衰退中的个体和团体参与（暴力）反抗的机会成本较低；最后，各种反对派力量可能利用经济衰退攻击中央政权。

（2）族群间经济差距的变化趋势

定量研究发现“垂直的不平等”（vertical inequality，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对族群冲突是否爆发的影响很小。^① 弗朗西斯·斯图尔特在2005年首先使用“水平的不平等”（horizontal inequality，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概念，并且证明了“水平的不平等”能够影响一国爆发内战的可能性。^②

本文同意“水平的不平等”能够影响一国内战爆发的可能性，但认为经济差距的变化趋势能够更好地反映落后族群因相对经济地位的动态变化而产生的“不满”：第一，如果经济差距在不断缩小，那么暂时存在的较大经济差距不一定会导致落后族群强烈的“不满”；第二，如果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那么暂时存在的较小经济差距也会导致强烈的“不满”。^③

在一个族群意识显著的国家或地区，经济竞争往往被理解为族群团体

①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56, No. 4, 2004, pp. 563-595.

② Frances Stewart,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 Neglected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 in UNU-WIDER," *Wider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London: Palgrave, 2005).

③ 本文仅仅分析了经济差距的变化趋势对落后族群集体情感（“不满”）的影响，忽略了优势族群的集体情感。因为，相对经济落后的族群，优势族群对经济差距变化趋势的敏感程度明显更低，而且优势族群因经济问题而产生的“不满”能够更多地被“经济衰退”这个变量所涵盖。例如，即使族群间的经济差距缩小可能导致优势族群对（原来的）落后族群的“不满”，但是这种“不满”可以被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所抵消。族群间的不平等根据其来源的不同至少可以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由于前文已经分析了由歧视性族群政策导致的政治不平等会引起族群间的“恐惧”和“仇恨”，因此，本节只讨论因族群间经济差距及其变化趋势导致的经济不平等（集体“不满”）。

之间为了经济机会和经济资源而进行的竞争。^① 族群间经济差距的变化往往成为落后族群集体“不满”和“恐惧”的重要来源: ①族群间经济差距扩大导致落后族群会因为经济地位的降低而产生对优势族群的强烈集体“不满”; ②经济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后, 落后族群将不得不面对优势族群的“经济威胁”和“集体身份的危机”, 因而落后族群会产生集体的“恐惧”; ③族群间经济差距的缩小造成落后族群的“不满”可能逐渐降低, 但是由于其相对能力的提升, 落后族群可能向中央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如政治权利)。

5. 历史因素: 族群间的历史冲突

族群交往历史中发生的冲突历来受到族群冲突研究者的关注。^③ 考夫曼在其关于族群冲突的“象征性政治”理论中提出“存在能够合理化敌对行为的族群神话是族群暴力冲突发生的必要条件”, 但他过分强调了族群神话的作用。^④ 族群间的历史冲突可能包含很多形式: 殖民主义、奴隶制、族群战争、种族屠杀等。通过将族群之间的历史冲突带入安全困境的分析模型中, 我们可以更精细地了解历史冲突对现实的影响。

(1) 历史冲突容易造成族群间的“不信任”并增强安全困境下的相互“恐惧”。行为体的声誉会影响其他行为体对其意图的判断。如果某族群曾经主动挑起过暴力冲突, 则这个族群无疑会因为其历史侵略行为而被其他邻近的族群怀疑和疏离, 这就导致曾挑起冲突的族群释放出的善意得

① Stephen M. Saideman, “Is Pandora’s Box Half Empty or Half Full? The Limited Virulence of Secessionism and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Disintegration,” in David A. Lake and Donald Rothchild, eds.,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Ethnic Conflict: Fear, Diffusion, and Escal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35.

② 唐纳德·霍洛维茨认为“对被统治的恐惧”(fears of domination)是族群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断拉大的经济差距和族群政治地位的降低都可能导致族群群体生产这种“恐惧”。参见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p. 175。

③ 关于族群冲突的“古代仇恨说”, 参见 Robert D. Kaplan, *Balkan Ghosts: 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1994)。

④ 考夫曼无法解释两个族群间的第一场暴力冲突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在第一场族群暴力冲突发生之前, 两个族群间不会存在由历史上的暴力冲突引发的族群“神话”。参见 Stuart J. Kaufman, “Symbolic Politics or Rational Choice?”。

不到信任，其对安全的诉求容易被当作威胁。此外，族群中心主义的心理导致经历过冲突的族群倾向于将责任推给其他族群，所以大多数族群可能都是某些其他族群集体记忆中的“侵略者”。在族群间安全困境存在的前提下，这种“不信任”往往能增强族群相互间的“恐惧”。

(2) 历史冲突会造成族群之间的“仇恨”。除了增加族群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恐惧”外，历史冲突还会导致族群间的“仇恨”。族群间历史冲突的存在意味着至少有一个族群曾经在冲突中遭受过集体损失。这种损失不仅仅反映在物质方面（如伤亡人数），还体现在非物质方面（如失败导致的集体羞辱感）。^① 因为族群对相对价值（地位）的极度敏感，这些损失往往会造成族群之间的“仇恨”。

此外，族群之间的历史冲突作为一种显著和持久的群体记忆，往往被精英有意识的政治化，以塑造一种单一的、排外的集体认同。^② 因此，历史冲突导致的“仇恨”往往被镶嵌在集体认同中，它的显著性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减弱，但只要族群间没有实现全面的和解，“仇恨”随时可能爆发。

6. 地理因素：族群人口分布的类型

族群冲突学界对地理因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族群聚居地崎岖复杂地形的比例、^③ 少数族群聚居地区距离国家政治中心的距离、^④ 地区的族裔多样性^⑤和族群分布的集中性^⑥等因素都被认为与族群冲突有正相关关系。

① 关于相似的观点，可参见 Marc Howard Ross, *Cultural Contestation in Ethnic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7.

② Rogers Brubaker and Frederick Cooper, "Beyond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 1, 2000, pp. 1-47.

③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④ Halvard Buhaug, Lars-Erik Cederman and Jan Ketil Rød, "Disaggregating Ethno-Nationalist Civil Wars: A Dyadic Test of Exclus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2, Issue 3, 2008, pp. 531-551.

⑤ Erik Melander, "The Geography of fear: Regional Ethnic Diversity". 埃里克·梅兰德的文章为作者关于族群人口分布的讨论提供了很多灵感，但是梅兰德的逻辑与本文不同：他强调族群杂居使得“先发制人”的战略对各个族群同时产生威胁和诱惑，因此杂居更容易导致族群冲突。

⑥ Monica Duffy Toft, *The Geography of Ethnic Violence: Identity, Interests, and the Indivisibility of Terri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由于本文仅仅希望说明地理因素可以被纳入“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所以并未全面地考察这些关于地理因素的假说,而仅仅选取了“族群人口的分布类型(杂居或聚居)”这个因素进行分析。对于 A、B 两个族群来说,族群杂居指的是:相当一部分(统计上有意义的)A 族群的成员与 B 族群的成员杂居在某片地理区域;族群聚居指的是:几乎所有的 A 族群的成员和 B 族群的成员分别居住在各自族群占主导的区域内。^①

本文强调,当两个族群间的安全困境被激活后,相比族群聚居,族群杂居能够通过放大族群互相间的“恐惧”和“仇恨”并且增大“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来恶化族群间安全困境和冲突螺旋。^②

(1) 杂居地区的“接近性”能够增大“恐惧”和“仇恨”。相比族群聚居地区的居民,地理上的“接近性”导致杂居地区的居民对族群间的互动更加敏感。例如,A 族群的行为首先影响到的的是与 A 族群距离较近的 B 族群成员,而较少影响到与 A 族群距离较远的其他族群成员。同样的道理,歧视性族群政策或者精英对历史冲突的渲染将首先导致杂居地区的族群成员对其他族群的“恐惧”和“仇恨”迅速上升。当杂居地区的族群成员意识到他们的家庭正在被“历史上的敌人”所威胁,族群成员参与集体抗争的动机最为强烈。例如,在 1994 年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前,胡图族与图西族互相之间的威胁感知在杂居程度更高的北方地区比图西族占绝对优势的南方地区更为明显。^③

(2) 杂居地区的“不可分割性”能够增强“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杂居地区的“不可分割性”能够将集体负面情感扩展到更大的地理范围。例如,与 A 族群距离较近的 B 族群成员感受到的“恐惧”和“仇恨”可

① 在现实中,绝对的聚居,即所有族群成员定居在某个只含本族群成员的地区,基本是不存在的。

② 关于族群杂居能够增大族群间交流、缓解冲突的观点,参见 Ivo D. Duchacek, *Comparative Federalism: The Territorial Dimension of Poli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关于族群聚居有利于反抗的观点,参见 Monica Duffy Toft, *The Geography of Ethnic Violence*。

③ Osmar Shahabudin McDoom, “The Psychology of Threat in Intergroup Conflict”。

能会被传递到整个 B 族群，从而起到放大整个 B 族群对 A 族群的负面集体情感的作用。“不可分割性”对集体情感的传递效果往往被族群精英所利用，通过夸大处于劣势地位的族群同胞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所处的危险境地，精英能够使每个族群成员感同身受。在这种互动过程中，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族群精英深刻明白此间的道理，无怪乎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塞族人的保证——“没人再敢揍你们”——迅速为他奠定了塞族领袖的地位。^①

（三）小结 “安全困境/机制 + 因素”的分析框架

上文通过分析各种因素对驱动力的影响以及驱动力对安全困境机制的调节作用，初步展现了一个具体的“安全困境/机制 + 因素”分析框架（见图 2）。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安全困境机制能够将各种对族群冲突存在影响力的因素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相对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虽然这里的分析框架是初步的（并未包含其他具有解释力的变量和驱动力），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①通过初步具体化“安全困境/机制 + 因素”分析框架，说明了这条理论路径的可行性；②为建立更加完善和整合式的族群冲突理论起到了铺路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安全困境/机制 + 因素”分析框架的解释力，下文将用此分析框架解释捷克斯洛伐克（1968—1993）和南斯拉夫（1971—1991）两个案例中族群政治的不同走向。

四 案例比较：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

这一部分我们将验证初步具体化的“安全困境/机制 + 因素”分析框架对族群冲突的解释力。为了达到验证的目的，我们选择了捷克斯洛伐克

^① Laura Silber and Allan Little, *Yugoslav: Death of A Na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7), pp. 36-37.

(1968—1993) 和南斯拉夫 (1971—1991) 两个案例进行比较研究。选择这两个案例的合理性在于: (1) 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在历史、政治、地理等方面的相似性使得这两个案例构成了“天然”的“最相似系统设计”(most similar system design), 为比较研究提供了方便。^① 例如, 两国都是诞生在封建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民族自治和融合的基础上, 它们在二战后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捷克斯洛伐克属于华约集团, 而南斯拉夫则是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2) 如果研究者能够证明某个机制能够同时解释正面案例和(相关的)负面案例(具有相似初始条件的案例 A 和 B 分别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那么研究者就更有信心相信这个机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② 如果这个初步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能够同时解释这两个案例中分别出现的“和平”与“冲突”, 那么它的解释力以及理论上的潜力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证明。^③ (3) 这两个案例中的族群政治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天鹅绒式的和平分离”与“巴尔干式的族群冲突”, 选择这两个案例能够避免比较政治中常出现的“依据因变量选择案例的谬误”。^④

(一) 两个案例中族群间安全困境的相似之处

约翰·穆勒(J. S. Mill)很早就指出, 学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混合使

① John S.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82), pp. 281 - 282. 在线版本见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27942/27942-h/27942-h.html>。

② 关于“如何发现并验证机制”, 参见唐世平的讲义《迈向基于机制的解释和理解: 负面案例和反事实思考》。

③ 詹姆斯·费尔荣和大卫·莱廷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个好的族群冲突理论必须能够同时解释族群的和平与冲突”。参见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xplaining Interethnic Cooperation”。

④ 本文寻求解释的因变量是“族群之间是否发生了暴力冲突”, 而不是“多族群国家是否解体”。虽然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最终都解体了, 但两国解体的方式大相径庭: 南斯拉夫发生了大规模的族群间暴力冲突, 捷克斯洛伐克主要族群则和平分离。关于“依据因变量选择案例的谬误”参见 Barbara Geddes, “How the Cases You Choose Affect the Answers You Get: Selection Bia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Analysis*, Vol. 2, No. 1, 1990, pp. 131 - 150。

用“最相似系统设计”和“最差异系统设计”来进行比较研究。^①虽然本文总体上是使用“最相似系统设计”来探究这两个案例中哪些因素对族群间安全困境的调节导致两国族群政治的走向大相径庭，但本节使用“最差异系统设计”的思路来考察这两个案例的相似之处，即共同具有的且赋值相同的因素（政治不稳定、族群政党系统和经济衰退）导致两国都曾存在被激活的族群间安全困境。此外，本节的讨论还为下一节分析两个案例中族群间安全困境的不同走向打下了基础。

1. 政治不稳定

20 世纪 80 年代，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和自治省日益“独立化”，联邦机构不断“边缘化”。^②铁托在任期间凭借其极高的威望尚能平衡南斯拉夫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纷争，保持国家统一。在后铁托时期，分权体制、族群矛盾、经济衰退、苏联解体和民主化浪潮等因素一起，导致南斯拉夫国内政治愈发不稳定，无政府状态越发明显。到 1989 年，联邦宪法和制度实际上已经被各主要共和国抛弃，南斯拉夫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已经形成。^③

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不稳定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布拉格之春”事件以及随后在苏联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正常化”（normalized）政权。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由于不愿听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建议并且无法积极应对国民的改革呼声，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政府的控制能力不断削弱。^④民主反对派逐渐从监狱和地下走上了广场和前台，民众对政府的恐惧渐渐消失。^⑤随着中央政权渐渐瘫痪，捷克斯洛伐克族群间无政府状态达到顶峰。在“天鹅绒革命”后，虽然捷克斯洛伐克仍然存在严重的经济、社

① John S.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pp. 279 – 289.

② Laura Silber and Allan Little, *Yugoslav*, p. 34; Badredine Afri, “Ethnic Fear,” pp. 179 – 181.

③ Mitja Velikonja, “Slovenia’s Yugoslav Century,” in Dejan Djokic ed., *Yugoslavism: Histories of A Failed Idea, 1918 – 1992* (London: C. Hurst & Company, 2003), p. 96.

④ Bernard Wheaton and Zdenek Kavan, *The Velvet Revolution: Czechoslovakia, 1989 – 1991*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2), pp. 3 – 18.

⑤ Bernard Wheaton and Zdenek Kavan, *The Velvet Revolution*, pp. 23 – 30.

会和族群等问题,但是过渡政府的成立有效地缓解了国内族群间的无政府状态。^①

总体来说,上述两国的政治不稳定及其引发的无政府状态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日益加深,并且在同一年(1989 年)同时出现了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国家是否出现无政府状态对于能否使用安全困境机制解释国内族群问题十分关键,因为国内的无政府状态是族群间安全困境的首要来源。

2. 族群政党系统

冷战后,这两个国家陆续都采用了依据族群(地区)原则来建立各个自治实体的党组织,这些族群(地区)政党相互之间具有竞争有限资源的特点。东欧剧变后,两国族群政党体系的特征更加明显。首次多党选举造成了各自自治实体的族群政党都获得了绝大多数的议会席位。^② 本文认为两国的族群政党系统都分别造成各自国内政治的不稳定,并增强了两国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

铁托在任期间,他尚能采取严厉但平衡性的惩罚措施来解决族群政党系统对政治稳定的负面作用。^③ 铁托去世后,族群政党体系立刻导致南斯拉夫的国内政治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政治不稳定状态日益明显。由于政治选项被限制,塞尔维亚的精英往往要求联邦重新实行中央集权,而反对集权(或保留意见)的塞族精英往往很容易因其对塞族的“背叛行为”而被踢出政治舞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④

此外,纵观整个南斯拉夫,族群政党系统赋予了族群精英在各自共和国内拥有超凡的“能力”来动员族群并塑造排外性的集体认同。以塞尔维亚为例,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塞族政党上台后立即控制并利用塞尔维亚的

① Vaclav Havel, “New Year’s Address”, in Paul Wilson ed.,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 (NY: Vintage Books, 1991), pp. 390–391.

② Dawn Brancati, *Peace By Design*, pp. 21, 571.

③ Stevan K. Pavlowitch, “Serbia, Montenegro and Yugoslavia,” in Dejan Djokic ed., *Yugoslavism*, p. 67.

④ Laura Silber and Allan Little, *Yugoslav*, pp. 38–42, 82–83.

主要媒体（如贝尔格莱德电视台）来煽动塞族人对联邦机构和其他族群的负面情感，非官方媒体的影响力被降至最低程度。^①

在后“布拉格之春”时代，捷克斯洛伐克族群政党体系的建立实际上制度化了这个国家的两元性。^②“天鹅绒革命”后，随着国民与“正常化”政权之间的主要矛盾得到解决，国内族群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族群政党系统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政治的影响更为明显。捷克斯洛伐克两个地区的主要族群政党对于经济改革的步伐和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这两个主要问题争执不下，没有一方愿意妥协。^③虽然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民众反对独立，^④但是，族群政党通过各自掌控的媒体资源和行政资源影响和动员各自族群的选民，在联邦和地区议会上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最终促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解体。^⑤

3. 经济衰退

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形势在1980年后都急转而下。如表2所示，1971—1980年，南斯拉夫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值的年均增长率都相当于当时西欧国家的两倍左右；但是，南斯拉夫良好的经济形势在80年代初经历了逆转，这两项经济指标大幅下降。^⑥

南斯拉夫的经济衰退导致所有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不满”，并且造成了国内政治的不稳定状态。由于南斯拉夫族群问题的显著性更高，南斯拉夫的政治精英更容易将民众因为经济衰退产生的对联邦政府的“不满”引

① Jack Snyder and Karen Ballentine, "Nationalism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p. 49.

② Badredine Afri, "Ethnic Fear," p. 168.

③ Jaroslav Krejci and Pavel Machonin, *Czechoslovakia, 1918 - 1992: A Laboratory for Social Change* (NY: ST Martin's Press, 1996), p. 49.

④ 在1990年（1992年），分别只有11%（约15%）的捷克人和12%（16%）的斯洛伐克人赞成国家分裂。数据来源于I. Tomek and V. Forst, "Czechoslovak Citizens' Attitudes Towards Federation," Prague, Czech Republic: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90, in Dawn Brancati, *Peace by Design*, pp. 68 - 69.

⑤ Dawn Brancati, *Peace by Design*, p. 21.

⑥ 表2中的经济数据根据经合组织发展研究中心2003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历史统计》中的数据计算而来，参见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2003), pp. 99 - 101, 233 - 234.

表 2 南斯拉夫与西欧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比较 (1971—1990)

单位: %

	南斯拉夫		西欧	
	国民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率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率	国民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率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率
1971—1975	3.8	3.1	2.3	2.5
1976—1980	4.8	4.2	2.2	1.9
1981—1985	0.9	0.6	1.5	1.4
1986—1990	-0.2	-2.5	2.3	2.0

导致其他族群身上,更容易使民众相信经济衰退是由其他族群的贪婪和剥削造成的。南斯拉夫的政治不稳定被经济危机增强了。^①

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衰退同样明显(见表3),使用不同来源的资料都表明:在1976年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陷入低迷状态;进入80年代,经济的年增长率长期保持在1%上下。民众因经济衰退而产生的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加重了90年代末的国内政治危机。^②“天鹅绒革命”既是这种“不满”的产物又疏导了这种“不满”。1989年后,由于族群间安全困境已经被过渡政府遏制,政治精英(特别是斯洛伐克精英)只能通过将经济衰退归罪于其他族群来动员本族群。

表 3 捷克斯洛伐克的年均经济增长率 (1968—1988)

	净物质生产(%)		国内生产总值(%)	
	官方数据	纳齐提加的数据 (Nachtigal)	奥尔顿等人的数据 (Alton et al.)	纳齐提加的数据 (Nachtigal)
1971—1975	5.7	4.8	3.4	4.9
1976—1980	3.7	1.0	2.1	1.9
1981—1985	1.8	0.9	1.2	0.2
1986—1988	2.3	0.6	0.9	1.1

资料来源: Jaroslav Krejci and Pavel Machonin, *Czechoslovakia, 1918 – 1992*, p. 92。

^① Tihomir Cipek, “The Croats and Yugoslavism,” in Dejan Djokic ed., *Yugoslavism*, p. 82.

^② 不可否认,“政府对多样性的压制”也是影响本文两个案例中群体“不满”的重要因素。

根据对这两个案例相似性的分析，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在 1989 年都存在被激活的族群间安全困境、民众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和精英具有动员族群的“能力”，但是两国族群政治的走向却大相径庭。这样的案例比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①虽然精英具有一定的动员族群的“能力”，而且民众“不满”中央政权，但是，族群间安全困境仍然可以被遏制；②被遏制的族群间安全困境可以为族群间的和平打下基础；③安全困境的恶化还需要其他因素和驱动力的调节。

（二）两个案例中族群间安全困境的不同走向

下文通过对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四个因素（族群间一直存在的较大经济差距、历史冲突的存在、歧视性族群政策的实施以及族群杂居）通过对四个驱动力的影响，最终导致南斯拉夫族群间安全困境和冲突螺旋不断恶化，而捷克斯洛伐克之所以能成功遏制族群间安全困境与其缺乏这些致命因素不无关系。

1. 族群间经济差距的变化趋势

二战后的南斯拉夫政府虽然力图通过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资和转移支付力度来平衡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由于低效率以及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速过快等原因，南斯拉夫主要族群间的经济差距并没有缩小。以 1953—1977 年的人均国民物质生产来衡量各个自治实体的发展水平，我们会发现：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扩大了它们在联邦中经济领先的地位；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维持了联邦中游的地位；黑山、波黑、科索沃与联邦中发达地区的差距明显拉大，其中科索沃人均国民物质生产从 1953 年占联邦平均值的 46% 下滑到 1977 年的 30%。^①

南斯拉夫持续存在的族群间经济差距导致落后族群（塞族、阿尔巴尼亚族等）对优势族群的“不满”变得更强烈。此外，南斯拉夫这种呈

① Jaroslav Krejci, *National Income and Outlay in Czechoslovakia, Poland and Yugoslav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p. 67.

扩大化趋势的经济差距还导致了落后族群因集体身份危机而产生的“恐惧感”。这种显著的集体“不满”和“恐惧”导致南斯拉夫落后族群的成员更愿参与针对其他族群的集体行动。

反观捷克斯洛伐克，20 世纪 20 年代，斯洛伐克的人均收入只有捷克地区的 42%，这种差距在二战之前一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① 二战后，帮助斯洛伐克在经济方面赶上捷克成为联邦政府的重要战略。斯洛伐克地区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使得它与捷克的经济发展程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几乎达到同一水平（见表 4）。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发生由经济差距导致的族群间“不满”。

表 4 捷克与斯洛伐克经济均等化的过程

	单位: %		
	1948	1968	1989
工业化	54.5	82.0	92.6
机械化	58.0	86.5	97.1
人均物质产品净值	61.2	79.9	87.8
月均工资	91.5	98.7	98.8

说明：表中数据表示斯洛伐克各项经济指标占捷克相应指标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Jaroslav Krejci and Pavel Machonin , *Czechoslovakia , 1918 – 1992* , p. 102。

2. 历史冲突

南斯拉夫各族群间发生冲突最多的两组族群分别是塞族与克族、塞族与（科索沃的）阿族。由于这两组族群间的冲突有相似的模式，下文仅分析前者。^②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联合王国”（第一南斯拉

① Ales Capek and Gerald Szazama, “Czech and Slovak Economic Relations,” *Europe-Asia Studies* , Vol. 45 , No. 22 , 1993 , pp. 211 – 235.
② 关于塞族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间的历史冲突参见 Roger D. Petersen , *Understanding Ethnic Conflict* , pp. 242 – 248。

夫) 自诞生之日起, 塞族和克族对国家控制权的争夺就没有停止过。^① 二战期间的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乌斯塔沙) 在德国的庇护下第一次建立起了现代克罗地亚人的独立国家, 并在其掌权期间对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左翼克罗地亚人展开了大规模族群清洗, 将 190 万塞族人赶出了克罗地亚, 摧毁了大量的塞族东正教教堂。^② 乌斯塔沙对塞族人的族群清洗往往导致效忠于塞尔维亚王室的切特尼克部队对克罗地亚人的大规模报复性屠杀。二战期间塞克之间大规模屠杀的历史并没有在战后得到南斯拉夫官方的重视, 反而被隐藏在“兄弟友谊与团结”的旗帜下。

血腥的历史冲突造成了克族与塞族之间一致存在着“不信任”和“仇恨”: 每次克族要求增大共和国的自治权都被塞族认为是有意分裂塞尔维亚; 同样, 塞族对集权的偏好往往被克族人看做“大塞尔维亚主义”作祟。^③ 在安全困境已经被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激活后, “仇恨”“恐惧”和精英动员“能力”的相互增强效果迅速恶化了南斯拉夫族群间的安全困境。

在克族与塞族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两个时间段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二战期间, 捷克族与斯洛伐克族并没有发生冲突。^④ 缺乏历史暴力冲突使得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之间缺乏族群间负面情感, 削弱了“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

3. 歧视性的族群政策

二战后南斯拉夫各个自治实体曾施行的歧视性族群政策主要包括克罗地亚对其境内塞族人的歧视政策和塞尔维亚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歧视

① Tihomir Cipek, “The Croats and Yugoslavism,” Mitja Velikonja, “Slovenia’s Yugoslav Century,” in Dejan Djokic ed., *Yugoslavism*, pp. 72–84.

② Tihomir Cipek, “The Croats and Yugoslavism,” pp. 64, 84.

③ Badredine Afri, “Ethnic Fear,” p. 185.

④ 1918—1938 年, 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主要的族群问题是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德国人要求自治权甚至完全的独立。1939—1945 年, 斯洛伐克傀儡政权除了驱离过境内的 10 万捷克人, 并没有造成进一步的族群间冲突。参见 Jaroslav Krejci and Pavel Machonin, *Czechoslovakia*, p. 19.

政策。^①

1990 年 4 月,图季曼当选为总统后随即对克罗地亚塞族人实行了同化政策(“克罗地亚化”);5 月,由于图季曼不愿意满足克拉依那地区塞族人最低的要求——与克族人在宪法上保持同等的地位,他与克拉依那地区的塞族温和派领导人(Jovan Rašković)的会谈无果而终。^②同年 6 月,图季曼政府出台了宪法草案,这份宪法草案将未来的克罗地亚描述为“克罗地亚人的克罗地亚”,塞族人被定义为“其他少数族群”,歧视性(排斥性)的族群政策写入了国家法律。^③

图季曼对克拉依那塞族人平等地位的否定直接导致塞族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上台和随后塞族人和克族人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在南斯拉夫族群间安全困境已经被激活的情况下,图季曼的歧视性族群政策无疑迅速增大了族群间的“恐惧”和“仇恨”,是恶化族群间安全困境和冲突螺旋的直接因素。

相比之下,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政府制定的唯一具有“歧视效果”的政策就是 1990 年联邦总统哈维尔颁布的限制全国军工业出口的政策,这项力图推进经济改革的政策反而导致军工业集中的斯洛伐克地区失业率迅速上升,但是这项经济政策远远达不到歧视性族群政策的标准。^④

4. 族群人口分布的类型

归功于二战前后的几次大规模人口迁移,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分布非常紧凑,绝大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分别都居住在捷克地区和斯洛伐克地区。^⑤然而,南斯拉夫的族群人口分布情况则截然不同:除

① 为了简洁,本文仅分析塞克之间的互动。

② Laura Silber and Allan Little, *Yugoslav*, p. 119.

③ 参见 Paul Roe, *Ethnic Violence and the Societal Security Dilemma*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92 – 110.

④ Dawn Brancati, *Peace By Design*, pp. 77 – 79; Jaroslav Krejci and Pavel Machonin, *Czechoslovakia*, pp. 232 – 233.

⑤ 本文未详述捷克斯洛伐克的族群分布情况,详细信息可参见 Milica Z. Bookman, “War and Peace: The Divergent Breakups of Yugoslavia and Czechoslovaki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1, No. 2, 1994, p. 184。关于 20 世纪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参见 Dawn Brancati, *Peace by Design*, pp. 79 – 80; Jaroslav Krejci and Pavel Machonin, *Czechoslovakia, 1918 – 1992*, pp. 31 – 40。

了斯洛文尼亚地区，南斯拉夫其他主要族群间的杂居现象非常普遍（见表5）。

表 5 1990 年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国内主要族群的分布比例

各个共和国	主要族群分布(%)	各个共和国	主要族群分布(%)
塞尔维亚和黑山	塞尔维亚人: 63 阿拉巴尼亚人: 13. 5 黑山人: 5. 5	波黑	穆斯林: 39 塞尔维亚人: 32 克罗地亚人: 18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人: 75 塞尔维亚人: 12	马其顿	马其顿人: 67 阿尔巴尼亚人: 20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人: 91 克罗地亚人: 2. 9		

资料来源: Milica Z. Bookman, “War and Peace ,” p. 184。

杂居地区的“接近性”对族群间业已存在的“恐惧”和“仇恨”的放大效果明显体现在南斯拉夫的案例中。其实在 1990 年 4 月的克罗地亚大选中，克拉依那地区的大多数塞尔维亚人选择了支持跨族群政党（由前克罗地亚共盟中的改革派领导），而非塞族的族群政党。^①但是，在图季曼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获得大选胜利后的 4 月到 6 月，克罗地亚执行了歧视性的族群政策，并重新启用乌斯塔沙法西斯政权使用过的“红白格子”克族标志，造成克拉依那塞族人对克族人的“恐惧”和“仇恨”急速飙升。塞克间的族群冲突在 8 月首次爆发。次年，塞克之间的冲突螺旋进一步被恶化成“邻居间的厮杀”。^②

此外，杂居地区的“不可分割性”进一步增强了塞族和克族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以塞族精英为例，米洛舍维奇曾经明确地表示他

① Laura Silber and Allan Little, *Yugoslav*, pp. 95 – 96.

② 关于克罗地亚战争的惨烈性参见 James D. Fearon, “Commitment problems and the Spread of Ethnic Conflict ,” in David A. Lake and Donald Rothchild , eds. ,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Ethnic Conflict* , p. 114.

不关心斯洛文尼亚是否独立的问题，因为斯洛文尼亚几乎没有塞族人居住。^①然而在克罗地亚，米洛舍维奇则支持克拉依那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并且利用塞尔维亚的宣传机器妖魔化克罗地亚人，最终成功地将克罗地亚境内塞族人的“恐惧”和“仇恨”升级为大部分塞族人对克罗地亚人的“恐惧”和“仇恨”。^②

反观捷克斯洛伐克，族群聚居的事实使得（和平）分离更加容易。一个反事实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如果斯洛伐克某地区存在着在一定数量（统计上有意义）的捷克人，那么捷克与斯洛伐克是否还能和平分离呢？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族群矛盾的显著性相对较低，因此民族主义者很难利用杂居地区来扩大族群间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分裂，斯洛伐克境内的捷克人很可能会采用一种议会斗争的方式改变斯洛伐克议会中的力量对比，捷克斯洛伐克也许不会分离，但是政治精英在议会的竞争和妥协将继续。^③

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事实分析使我们更加相信前文的理论假设，即族群人口分布的类型本身并不能决定族群间是否会发生冲突，但是，当两个族群间的安全困境被激活后，族群杂居却能将安全困境恶化成冲突螺旋和战争。

（三）小结：过程追踪

根据上文对两个案例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分析，捷克斯洛伐克的案例存在三个可以增强驱动力的因素（政治不稳定、族群政党系统、经济衰退），而南斯拉夫的案例则存在全部七个因素。相应地，捷克斯洛伐克族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恐惧”和大众对中央政权的“不满”，精英具有

① Laura Silber and Allan Little, *Yugoslav*, pp. 113, 131.

② 关于米洛舍维奇动员族群的策略，参见 Paul Roe, *Ethnic Violence and the Societal Security Dilemma Yugoslav*, pp. 93–97。

③ 关于斯洛伐克族群政党如何以微弱的优势迫使斯洛伐克议会通过一系列支持独立的声明和法案，参见 Dawn Brancati, *Peace by Design*, pp. 84–85。

相对较弱的“族群动员能力”；南斯拉夫主要族群相互之间的“恐惧”“不满”和“仇恨”一直保持在很高的程度，精英具有更强大的“族群动员能力”。下文将使用过程追踪的办法帮助我们厘清这些因素和驱动力对两个案例各自族群间安全困境的调节作用。

1. 捷克斯洛伐克

二战后到“天鹅绒革命”前，捷克族与斯洛伐克族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并最终被消除，客观上削弱了这两个族群相互之间的“不满”。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大众对中央政权非常地“不满”。此外，“仇恨”和“恐惧”对捷克斯洛伐克主要族群的驱动作用非常有限，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案例缺乏导致这两个驱动力的大部分来源（缺乏族群间的历史冲突、歧视性的族群政策，并且主要族群间并无杂居现象）。

1989年11月，发生在首都布拉格的持续性大规模反政府游行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不稳定达到顶峰，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已经出现。但是，在被激活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族群间的安全困境并没有恶化。相反，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反对派通过为大众的“不满”代言而获得广泛支持，多党选举后建立的中央政权迅速遏制了族群间的安全困境，被遏制的安全困境和被减弱的“恐惧”为族群间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奠定了基础。

捷克斯洛伐克的族群间安全困境之所以在被激活后能够迅速被遏制，其原因包括：①族群间的心理驱动力仅仅存在由短暂的无政府状态带来的“恐惧”，主要族群间缺乏“不满”和“仇恨”，大众对中央政权的“不满”是集体情感的主要维度；②即使存在族群政党系统，“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仍然相对较弱，民主反对派的实力更强。

1990—1992年，捷克的政治精英希望尽快过渡到市场经济并停止联邦对斯洛伐克的经济补贴，相反，斯洛伐克的政治精英则希望放缓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强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角色，保持联邦对其的补贴政策。由联邦总统哈维尔主导的快速经济改革与斯洛伐克当时的经济结构

(计划体制遗留下的大量重工业和军工业) 之间存在矛盾, 较快的经济改革导致捷克斯洛伐克的失业率大幅增加。在这一时期, 虽然族群间安全困境已经被遏制, 但是, 族群政党系统对族群精英动员“能力”的提升效果, 以及族群间“不满”取代了大众对中央政权的“不满”成为主要的心理驱动力, 导致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无奈地走向和平分离。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反对派赢得了和平, 但是输掉了国家。

2. 南斯拉夫

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 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相似的经济衰退, 因此南斯拉夫大众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同样非常显著。但是, 由于南斯拉夫主要族群间的经济水平一直保持较大的差距(最发达和最落后族群之间的经济差距甚至被不断拉大), 这种差距导致落后族群对优势族群的“不满”和“恐惧”。两个维度的“不满”以及“恐惧”的存在使得落后族群更加愿意参与针对优势族群的集体冲突行动。此外, 仅仅在 20 世纪, 南斯拉夫主要族群间(克族与塞族、塞族与阿族)就发生过多多次暴力冲突, 因此南斯拉夫族群间的“不信任”和相互之间的“仇恨”非常显著。

但是, 犹如暴风雨前的宁静, 族群问题的显著性并没有导致南斯拉夫在 80 年代中期之前发生大规模的族群间暴力冲突。80 年代后半期,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南斯拉夫的政治不稳定状况越演越烈——各个自治体日益“独立化”, 联邦机构被不断“边缘化”, 无政府状态日益加深, 族群间的“恐惧”作为一种强大的心理驱动力渐渐掌控了群体的情感。至 1989 年, 联邦宪法和制度都已经被各主要共和国抛弃, 南斯拉夫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形成, 族群间的安全困境已经被激活。

一方面, 南斯拉夫“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因安全困境下族群问题的显著性、族群政党系统以及族群杂居而得到大幅提升; 另一方面, 飙升的“能力”使得族群精英可以通过歧视性的族群政策肆意地操纵并放大族群间的“恐惧”和“仇恨”。米洛舍维奇通过顺应并利用塞族的集体情感将自己塑造成联邦内所有塞族人的“保护神”。1989 年,

米洛舍维奇违背联邦宪法，擅自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地位，加深了其族群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恐惧”和“仇恨”；在南斯拉夫的另一个共和国——克罗地亚，1990年的多党选举将民族主义者图季曼推上总统宝座，当选后的图季曼立即制定了针对境内塞族人的同化政策和排斥性宪法草案。

至此，南斯拉夫族群间的安全困境已经迅速被恶化成冲突螺旋和随后的战争。究其原因，影响族群群体行为的三个心理驱动力和精英动员“能力”的相互增强效果，以及它们对安全困境的共同调节作用“功不可没”。1990年8月发生在克罗地亚克拉依那地区的塞克冲突成为随后数十年巴尔干族群冲突的一个缩影。在族群问题尤其显著的南斯拉夫，民主反对派无法像捷克斯洛伐克同行那样遏制族群间的安全困境。

通过以上的案例比较，一个基本的结论应该得到承认：初步具体化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能够同时解释“天鹅绒式的和平分离”与“巴尔干式的族群冲突”。因此，这个分析框架的解释力和理论潜力同时得到了验证。

五 结论

缺乏对安全困境机制的准确理解和恰当运用导致这个概念的理论潜力没有受到族群冲突学界应有的重视。本文通过分析各种因素如何作用于人类行为的四个主要驱动力（恐惧、不满、仇恨和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进而起到调节族群间安全困境机制的作用，展现了一个初步具体化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案例研究进一步表明了此框架的理论潜力。

“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相比其他族群冲突理论有两个主要优势：第一，包含了对社会结果的因果机制分析；第二，包容性的框架可以容纳更多的重要解释变量。因此，该分析框架可以告诉我们关于族群

冲突的完整故事，而非零散的片段。另外，包容性意味着该分析框架能够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解释力。

本文仅仅初步具体化了这个分析框架，未来的研究可以逐渐将更多的因素（甚至驱动力）整合进来。例如，近年来以拉斯－埃里克·塞德曼为首的研究团队通过定量研究在多篇文章中分别指出了若干个影响族群冲突的因素：①国家对强大的少数族群的排斥；②崎岖复杂地形在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的比例；③少数族群聚居地区距离国家政治中心的距离；④被国家排斥的少数族群是否有同胞生活在邻国；⑤族群的代表被排除在国家权力机构之外；⑥族群规模带来的组织能力。^③ 这些因素可以被有效地整合进“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第2、第3和第6个因素直接影响了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第5个因素肯定会导致“不满”，第1和第4个因素其实是“复合”因素，即既会影响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也会影响“不满”。

当然，除了将现有的因素和驱动力与安全困境机制联系起来，未来的研究还可以在多方面完善此分析框架：第一，通过机制去寻找因素，探究是否存在一些目前还没有被学界注意到的重要解释因素；第二，更加系统性地告诉我们不同因素之间、不同驱动力之间以及因素与驱动力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三，考察某些因素和驱动力是否构成族群冲突的必要条件；④第四，使用更多的实证研究（定量或定性）来验证该分析框架的解释力。

① Halvard Buhaug et al., “Disaggregating Ethno-Nationalist Civil Wars: A Dyadic Test of Exclusion Theory,” pp. 531 – 533.

② Lars-Erik Cederman, Luc Girardin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Ethnonationalist Triads: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Kin Groups on Civil Wars,” *World Politics*, Vol. 61, Issue 3, 2009, pp. 403 – 437.

③ Lars-Erik Cederman et al., “Why Do Ethnic Groups Rebel New Data and Analysis,” p. 88.

④ 唐世平认为“一旦我们接受‘因果关系需要因素和机制’，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不存在所谓的‘充分’因素以及‘必要充分’因素。因素只有‘必要’和‘非必要’之区分。”参见唐世平的讲义《迈向基于机制的解释和理解：负面案例和反事实思考》。

作者简介

王 凯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10210170049@fudan.edu.cn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著有《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Routledge, 2011)、《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 防御性现实主义》(Palgrave Macmillan, 2010) 等。

电子信箱: twukong@gmail.com

郭 扬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著有《军队创新体系》(合著, 2002 年), 译著有《军事力量对比》(合译, 2002 年)。

电子信箱: gygfdx@sina.com

谢 超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2008 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2004 年在哈尔滨理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xiechaocn@gmail.com

李少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09110170017@fudan.edu.cn

黄智虎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2010 级博士研究生, 商务部驻成都特派员办事处副处长。

电子信箱: 15011039927@139.com